

回

顧

羅光瑞

今年（民國九十八年）是榮民總醫院（現稱台北榮民總醫院，以別於後來成立的台中及高雄榮民總醫院）創院五十週年，院方舉行各項慶祝節目，其中一項為委托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主持的「口述歷史」。我因先後在榮總服務廿八年，口述記錄兩萬字，茲簡要節錄，提供鄉親指教。

國恩

我小學畢業那年，正逢日本侵華戰爭開始，由於學校數度因戰事遷移，整個六年中學過程於八年戰亂中方始完成。民國卅五年考入上海國防醫學院，再因國共戰爭，學校遷移來台，加上因病休學一年，也是八年才完成大學

學業。總的來看，我一生求學都是依靠國家公費制度，從初中到大學完全供給食宿及配給制服，在醫學院每月還領有零用金。假若不是這些公費學校，我是絕對沒有辦法完成學業。所以我对國家的教育之恩，視為「國恩」，銘記在心，沒有一天能夠忘記。

深造有得

我入國防醫學院簽約，畢業後必須終生服務軍旅。可是我自民國四十三年畢業後，四十年公職生涯中，有廿八年與榮總為伍。榮總是隸屬於行政院輔導委員會的非軍事機構，最大的轉折是在民國五十三年，當時我任職於陸軍八〇一總醫院（國防醫學院教學醫院）胃腸科

主治醫師，由於國防醫學院內科學系主任丁農恩師的推薦，我獲得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胃腸科博士後訓練（Post Doctoral Trainee）。那時候軍事機構人員出國進修，國防部最多只准一年，半年的也有，以免出國久了會耽誤軍職工作。我到美國一年後，按規定國防部要我回國，可是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（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）的訓練期限規定是兩年，這樣一來，訓練及研究工作就要面臨中斷的窘境。幸好那時我的指導教授（Wide Volviler），華盛頓大學的肝病學權威，主動寫了一封信給國防醫學院盧致德院長，信的內容不詳，不過真的盧院長替我擔保，於是我如願在美國完成進修。這種際遇，



在當時對我是一種莫大的僥倖。回國後，盧院長很快安排我任國防醫學院內科學系教官，並調榮總（盧致德兼院長）內科部胃腸科主治醫師。對此優厚的人事安排，真使我受寵若驚。細想我雖是盧院長任內畢業的學生，但他並不知我才學程度，推測也許是Wide Volviler教授致盧院長的推薦函發揮的作用。事後聽別人轉述，盧院長曾說：「我的學生出國留學，回來之後教授對羅光瑞的推荐信寫得很好。」

當年榮總腸胃科慢性肝病最多，其他為胃潰瘍等都還有治療的餘地，唯獨肝硬化肝癌等，則毫無辦法。所以我立志要研究肝病。可是到了美國後才發現，他們的慢性肝病大多是酗酒所引起，跟我國肝病大都來自病毒感染有截然不同的不同。此外，美國當時研究風向是人工肝臟及肝臟移植，這與我想學肝疾病防治方向也有落差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我心裡未免有些失望。不過還是努力學習肝臟病理，更重要的是學習先進的



疾病診斷及研究技術。民國五十五年回國後，針對國人特殊的病情，開始我們自創的研究項目，主要著重於病毒肝炎的自然史以及如何防治的重點上。

研究有成

民國七十年起，榮總胃腸科成立肝炎疫苗臨床試驗接種小組，我跟小組的同仁（包括胃腸科、小兒科醫師、檢驗師、護理師及研究助理等）陸續完成一系列新生兒B型肝炎臨床接種研究，包括高危險群新生兒B型疫苗接種計畫，接種後免疫效果的長期追蹤，小劑量疫苗對新生兒的免疫評估，以及國產疫苗的免疫評估等。這一連串的研究成果，均獲得國內外知名刊物發表。更重要的是透過肝炎防治委員會，促使政府開始重視這個困擾國人已久的「國病」，所以衛生署從民國七十三年起，把B型肝炎疫苗接種，擴大推動到全國實施。使台灣成爲全球第一個國家，以免疫注射達

到控制B型病毒的肝炎、肝疾病及肝癌的流行率。民國八十六年，世界衛生組織，把台灣的成功經驗，推介給各會員國，成爲國際間推行B型肝炎防治的典範。民國八十八年，台北榮總慶祝四十週年院慶，肝炎疫苗研究成果，榮獲建院以來傑出學術研究成就獎第一名。公元二〇〇〇年，我也因此獲頒美國癌症研究學會（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ancer Research）及中華民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傑出貢獻獎。爲國人的健康貢獻一己棉薄之力，是我一生感到最爲難得的榮幸，其餘的獎勵比起來，都屬於無關緊要。

績效管理

民國六十九年，蒙鄒濟院長的拔擢，命我負責籌建榮院台中分院，民國七十年起，擔任台中分院首任院長。由於全體同仁的共同努力，半年時間即開滿預設的六百病床，並達到財務盈餘的境地，六年任內，從未發生虧損。

除此之外，我還廢除了兩項醫界為人詬病的陋規，一是住院須繳保證金制度，特別是急診住院病人，突生重病已經是很痛苦了，還要叫他們到處張羅保證金，實不人道。實施後證明，會賴帳的病患極少，大多是社會救濟的對象。二是候床住院制度不夠公開化，讓病家常常作不必要的人情拜託，甚至收授紅包。台中分院一開始，病人住院除急診外，一律公開登記入院順序，曉示病人，按序通知入院，從未發生任何糾紛。

民國七十七年我接任台北榮總院長，那時候榮總剛經過鄒故院長高速擴張的過程，醫療經營實力大增，但也留下數億元經費的虧損。當時榮總已實施非營利性循環基金制度，自負盈虧責任。我認為榮總要站穩腳步，首先必須要健全財物，經過數年的努力，嚴格實施成本會計及績效企劃制度，終讓榮總轉虧為盈。民國八十年全國醫院評鑑，名列前茅。成爲第一個轉虧為盈的公立醫學中心。

除了財務管理之外，爲提昇榮總研究風氣，我於民國七十八年開始，從人事制度上著手，推行主治醫師以上升遷，以具有論文或教育部之部定教職者爲優先。在醫院的發展上，力求臨床技術及教導研究並重，運用績效獎金鼓勵。以上三管齊下，終於使榮總成爲醫學研究的重鎮，民國八十年單位學術論文發表，質量均居各醫學中心之冠。

結語

我於民國八十三年退休，獲頒母校國防醫學院榮譽醫學博士學位及衛生署一等衛生獎章。回顧此生求學及公職生涯，可用一帆風順來形容。求學過程雖在戰亂時期，但由於獲得國家公費資助，得以走完各階段學業。公職進階，全由師長及長官提攜，得以走完美好的旅程。自忖此生沒有什麼特殊成功的祕訣，祇是在人生的每一個階段，都從全力達成各階段任務爲主旨，盡可能做到超強的境地。